

##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藏藏文古籍

亚历山大·卓林 著

赵大莹 萨仁高娃 译

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译者按，又称东方手稿部）藏的大量写本和印本中，藏文文献因其数量之巨而占有特殊地位。据 1973—1975 年的登录簿，当时的藏品总数约 20500 件，这还不包括后来的新增藏品。

第一批入藏的藏文写本，最初是从今额尔齐斯河（Irtys）流域的阿布莱汗寺遗址中获得，于 18 世纪二十年代送到圣彼得堡。后来，学者米勒（G. F. Miller, 1705-1783）和帕拉斯（P. S. Pallas, 1741-1811）在西伯利亚地区探险，并走访居住在色楞格河流域的布里亚特部落。他们捐给俄罗斯科学院一些藏文文献，包括十二件藏文写本和十二件藏蒙双语写本。

19 世纪前半叶，是东方手稿部藏文藏品激增时代，尤其是 1835、1841 年两次购买大量写本文献。这些都是 Schilling von Canstadt（1786-1837）男爵的藏品。他曾作为政府官员在西伯利亚地区任职，热衷于收集东方书籍，因而从布里亚特庙宇中买了许多藏文木刻本，还请布里亚特僧人抄了一部分写本。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德格版《甘珠尔》。

另一部分藏文书籍来自中国的俄国教会。1835 年，院长彼得·卡门斯基（Kamensky, 1765-1845）捐赠四十三件藏蒙双语文献。

1847 年，《亚洲博物馆藏藏文文献总目》出版，其作者为学者施密特（J. I. Schmidt, 1779-1847）和拜特林古（O. von Böhtlingk, 1815-1914），他们将目录分成三个部分：藏文典籍（520 件），藏蒙双语文本（43 件）和复制件（141 件）。但这个目录并不完整，1848 年，学者施夫纳（A. Schiefner, 1817-1879）在他的文章中补充了《总目》中未提到的六十件双语或三语文本。

19 世纪后半叶，藏文藏品仍在继续增加。1851 年，亚洲博物馆收到学者瓦希里耶夫（V. Vassiliev, 1818—1900）从北京寄来的一包书，包括六十本藏文书和一些藏语和其他语言合璧的印刷书。

19 世纪末，尽管东方手稿部成为欧洲藏文文献的最大藏家，但仍不够全面，缺少一些基本的文献，如全套的《丹珠尔》，以及宗喀巴和五世达赖喇嘛等重要人物的文集。

柴比科夫（G. Tsybikov, 1873-1930）于 1899—1902 年对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及佛寺进行考察，之后巴拉迪因（B. Baradiyn, 1878-1937）于 1905—1907 年考察了安多的拉卜楞寺。他们仔细搜集了大量的优秀藏学者的文集，并送回亚洲博物馆，因此，亚洲博物馆的藏文藏品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柴比科夫收集品中包括在拉萨印刷的三百三十三卷文献，而巴拉迪因搜集到的一百六十九卷是在安多印刷的文献。

中国皇帝赠送给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套完整的北京版藏文《大藏经》，包括《甘珠尔》、《丹珠尔》，宗喀巴文集和章嘉呼图克图文集，亚洲博物馆因此得到了全套的《丹珠尔》。不过，章嘉文集不在东方手稿部。

因此，到 1910 年，俄罗斯学者拥有了他们所需要的主要藏传佛教典籍。能收藏这些独特的藏品归功于积极搜集和考古探险的俄罗斯学者、旅行家和外交官们，如学者奥登堡（S. Oldenburg, 1863—1935）、俄国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克罗特阔夫（N. N. Krotkov）、学者马洛夫（S. Malov, 1880-1957）和科兹洛夫（P. Kozlov, 1863—1935）上校。

奥登堡将他所搜集的 4—11 世纪敦煌文献交给了俄罗斯科学院，但是其藏文部分却被俄国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克罗特阔夫（N. N. Krotkov）送往圣彼得堡。这部分藏品不多，有二百一十六卷，其中一卷属于 12—13 世纪的作品，另外二卷是笔者于 2008 年在馆藏未整理的藏品中发现的。敦煌藏文文献多为《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复本。

1914 年 6 月 15 日，学者马洛夫购买了五十七件小木筒，上有藏文题字。这些木筒出自罗布泊附近的米兰

藏人边寨 (Tibetan fort), 今天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 但是 7—9 世纪时属西藏西北边界。木简的内容是军事和行政报告。就笔者所知, 除了东方写本部以外, 出自米兰的木简只有在英国斯坦因收集品中。

东方写本部藏文藏品最后一个构成是来自科兹洛夫从黑水城购买的藏文写本和木版印本, 是所有藏文藏品中最重要的部分, 约一百二十件, 尽管数量不多, 但是它们在考据学等方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东方写本部的藏文藏品迅速增加。1935—1937 年, 沃斯特莱科娃 (N. Yaroslavtseva-Vostrikova, 1902—1988) 整理了柴比科夫和巴拉迪因藏品, 除了这些, 另外登记了六千四百件典籍。这些典籍是由主持佛学院的代表们收集的, 如常于布里亚特和蒙古地区布里亚特寺院工作的学者舍尔巴茨基 (Th. Stcherbatsky, 1866—1942)、沃斯特莱科夫 (A. Vostrikov, 1904—1937)、欧帕米勒 (E. Obermiller, 1901—1935)、图比扬斯基 (M. Tubyansky, 1893—1937) 等。20 世纪三十年代, 前苏联领土上的大部分佛寺被关闭, 所藏大量藏文刻本 (许多是最流行文本的递刻本) 被送往列宁格勒, 最后交给了东方研究所。值得一提的是, 沃斯特莱科夫被捕后, 他的家被斯大林主义者查抄, 其藏品中的藏文典籍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 并被送往东方研究所。

东方手稿部的藏文藏品中具有西藏风格的佛教画像, 均为 20 世纪三十年代来自布里亚特的刻本。这部分藏品至少有一千五百件, 目前有一千一百件已登记和撰写提要。

另外一小部分重要的藏品是来自学者舍尔巴茨基的学生塞密考夫 (B. Semichov, 1901—1981), 1947 年, 东方手稿部从塞密考夫手中买来三十件藏文古籍。

1964—1975 年, 东方手稿部第一次对藏文藏品进行全面清查。因为几经搬迁后, 藏品处于极度混乱状态, 通过清查, 将之大体分类完毕。不过, 这个工作并不彻底, 2007 年, 一个重新编目的项目启动, 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以往持续不断的藏文藏品入藏史加以廓清。该项目的另一成果是从未经登记过的藏品中发现曾被遗忘的珍贵文献。今年, 笔者在萨维茨基 (L. Savitsky) 博士编目的敦煌写卷中找到三卷藏文写卷。通过仔细地研究, 笔者发现其中二件应该属于敦煌藏品, 另一件则有点像一个习字簿, 里面有许多互不关联的词, 应该是较晚期的。因为从书体上看, 这些字已经完全发展为藏文草书体 (“无头字”, dbu-med), 并且在音节 mi 当中没有 ya-tags。

两件敦煌卷子内容是《大乘无量寿宗要经》, 两个卷轴分别由四张和三张纸连接而成, 根据文本内容都可以分别分成八段和六段。两个卷轴均为墨笔书写, 纸张均微黄, 但第二个卷轴有红笔修改, 且纸质粗糙。从写卷内容上可以找到它们与其他写卷的关联之处。例如第一个写卷上的抄手叫做 “Se-thong-pa”, 可以从另外九个卷子 (Д х. т и б 193, 195, 196, 197, 198, 208, 209, 210, 211) 中找到类似的 “ser-thong-thong”。这些抄写者叫做 “phab-dzang”, “phab-ci”, “dpal-mchong”。这些名字都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得到。第二个写卷只有两个抄写者的名字: “dzeng-the” 和 “de’ u-ing”。所以,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写卷。通过名字, 可以将其他写卷与之联系起来。

现在很难说还能够在既有藏品中发现任何新的敦煌写卷, 而原来敦煌写卷中有一个应该是黑水城收集品而被山姆 (Sam van Schaik) 错误地放入了敦煌藏品。当笔者第一次借出这件写卷时, 它有八张纸, 并被错误地编号。它应该是马哈嘎拉礼拜仪式的礼典, 不过其内容并不在藏文《大藏经》中, 虽然大部分内容能够释读, 但是在《大藏经》的索引中找不到相应的标题。例如, 笔者找到了两首赞美诗, 并且在笔者的博士论文中加以考释, 非常有意思的是, 其中一个比《大藏经》中的版本要短很多。对这个写卷的深入研究, 笔者将继续进行下去。